

牢牢把握和立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

——重读邓小平《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 杨 肖

时代背景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对中国国情作了全面、深入的探索。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作了深刻论述。其谈话的一部分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这篇讲话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党领导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征程。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弄清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并对中国国情作出科学的判断。改革开放之前，党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曾出现过失误。导致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党在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中国国情问题上出现了偏差，如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认识不清，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困难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等，犯了“左”的错误。当时，党和人民迫切需要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中国国情理论进行破题。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提出符合国情的战略目标。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理想和目标。要实现共产主义，需要实现很多阶段性目标才能达到。到1987年，改革开放已经开展了十个年头。十年间，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虽然很大，但与共产主义的远

大理想相比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当时，党和人民迫切需要制定一个符合国情和实际的战略目标和规划。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弄清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党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要问题上也出现过挫折。由于缺乏经验以及对国情认识不足，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先后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失误，最终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死胡同，造成了重大损失。实践证明，这一时期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既有成绩也有失误，虽然成绩是主流的，但最终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正确实践，为我们党解决这一理论问题奠定了基础。当时，党和人民迫切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一命题作出明确解答。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需要弄清人民群众在其中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弄清怎样认识和对待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

主要观点

深入分析中国国情，科学地提出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分阶段的。其中，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

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邓小平指出，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和生产力高度发达、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还有很长的距离。因此，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战略目标、路线、方针、政策。

从国情出发，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邓小平提出，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30年到50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他强调，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这一战略目标，始于1979年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的小康社会，形成于1987年4月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构想，确定于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从而为全党、全国人民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三步走的总体部署。这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是根据当时的国情提出来的，符合中国的实际和发展趋势。

立足国情，深入探索，提出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等是实现战略目

标的路径选择。邓小平强调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要艰苦奋斗，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还深刻指出，要实现我们的雄心壮志，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同时，改革一定要保持社会主义方向。他指出，党的十三大要重申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不能搞无政府主义。他还提出要使党的领导班子更加年轻化，同时保证政策的连续性。

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实际出发，提出要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邓小平指出，我们真正的变化还是在农村。一搞改革和开放、承包责任制，经营农业的人就减少了。剩下的人怎么办？他指出，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邓小平强调，这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邓小平指出，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要相信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重要启示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情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牢牢把握和立足当前的基本国情。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所处的历史阶段。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把握新时代基本国情，要牢牢抓住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这个主线不动摇。同时，要认识到“两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邓小平提出的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到上世纪末已提前实现了前两步。在此基础上，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要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提出的新的宏伟战略目标，是对邓小平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的新发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目标就是实现以“两个一百年”为核心目标的中国梦。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不动摇。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努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综合经济实力。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不动摇。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坚持改革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不动摇。要深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继续扩大开放，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充分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励人民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更有获得感。

重读經典

用典释义

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

【讲话原文】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也70年了。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古人说：“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应该看到，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及时整治，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甚至可能酿成全局性、颠覆性的灾难。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9年6月24日）

【出处】

是则圣贤之意，较然著明，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盖为人之行己，必有过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遂非。迁善则其德日新，是为君子；遂非则其恶弥积，斯谓小人。故闻义能徙者，常情之所难；从谏勿拂（fú）者，圣人之所尚。至于赞扬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过不吝为言，或以有阙能补为美。

——（唐）陆贽《翰苑集·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论事状》

【解读】

陆贽（754—805），唐德宗时宰相，杰出的政治家，著有《翰苑集》。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唐德宗在泾原兵变后逃离长安，至奉天（今陕西乾县）又被叛军围城。千里救驾的朔方军节度使李怀光在解奉天之围后，又被奸臣阻隔，不能面见皇帝，形势极其严峻。陆贽向德宗连上《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论事状》等三份奏疏，分析了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

要广开言路、从谏如流。《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五》长篇引用了陆贽的这篇奏疏，并称“上颇采用其言”。

陆贽在《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论事状》中指出，自古以来，因为上下之情不通，造成乱多治少。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九弊”，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懦（懦），此三者，臣下之弊也。”故而君王不仅要虚心纳谏，还要不吝改过。陆贽认为历代圣贤“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意思是只把过而能改作为能事，不把不犯错误看得很重。并指出智者和愚者对待过错截然不同的态度：“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遂非。”聪明的人勇于改正过错，就能向好的方面发展；愚蠢的人耻于改正过错，就会一错到底。他还以唐太宗兼听纳谏成就千古圣君为例，认为太宗成功的关键，在于彻底克服了“闻过则羞己之短，纳谏又畏人之知”的心理，真正做到了“有过必知，知而必改”。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开展之际，中央政治局以“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为题举行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为此，他引用了陆贽的“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意在强调要坚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纯洁党的队伍，保证党的肌体健康。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杨立新）

李大钊：读书求真知 务实求真理

□ 冯 兵 樊子豪



优。”中学时的同学这样回忆：“生性俭易，聪爽绝伦，受课之余好读康梁文字，手把一编，日无暇息。”他的一生，除为革命奔走外，许多时间都伴着黄卷青灯，埋头苦读，伏案疾书。李大钊读书具体数量已不可考，但其著述400余篇，百万余字，引用国内外书刊500余种。仅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发表的论文、演讲、杂文、讲义等就有140篇，平均每6天发表一篇。在一篇谈论“弹劾”的短文中，李大钊旁征博引，贯通古今中外，不仅引述《后汉书》《说文》《六书》用作文字考证，而且还用《法兰西宪章》《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有关条文作诠释。李大钊所读的书，可以从他所写的文章中透露出，他读过卢梭的《民约论》和托尔斯泰的书，并且深受其影响。

日本教育家清水安三曾赞叹李大钊阅读量之大，他回忆在北京与李大钊交往的情景时说：“罗素访问中国时，我只读过其《自由之路》《形而上学》和《哲学问题》等三部著作，李大钊却把其所有的著作都读过一遍。李大钊还用英文读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李大钊在《言治》上发表的文章、通讯、诗词共28篇首，从文章中所引述内容及用词用典，足见其渊博的学识与深厚的基础。

求真

李大钊读书，对书中的议论决不盲从和迷信，而是采取思考、商议的

态度。李大钊说：“知识是引导人生的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昧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发展的障碍。”他反对死读书，认为念书而不思考有可能变成蛀书虫，好学生不能死啃书本，对世界上的事情毫不关心。他教育子女“不要光在课本上兜圈子，你们也应该学着看一点课外读物，把眼光放远大一些。开阔开阔视野才好”。他认为“千古之文章，千古文人之血泪也”。一本好书应“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启发众生之天良，觉醒众生之忏悔，昭示人心来复之机”。绝不应是以“愁怨之声，凄怆之语，痛人心脾，断其希望”。他强调读书要和现实相结合，写在书上的前人或同时代人的思考成果，而社会向前发展的进程从未停滞，如何与时俱进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进程和规律性，变成了读书时必须的思考。

李大钊治学的求真思想还体现在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的读书方式上，他读书时随时做笔记，把要点记下来。他认为记笔记的方法可以各取所需：一是看完一本书，把这本书的大纲、要点记下来；也就是把这本书里的精华部分吸收下来，成为自己的东西，不致天长日久就忘得一千二净。二是写卡片，把这本书里的主要材料，觉得可以运用的就抄下来。这样的方法已经化为一种思想和习惯，在李大钊的日常读书与写作中随处可见。但李大钊反对将资料 and 观点不加考证和思索的照抄照搬，他援引别人的观点时总是经过自己消化吸收了的。比如，他曾师从有贺长雄，学习《国法学》，却在《国情》一文中批判了有贺长雄；他曾师从浮民和民，学习《社会学文献选读》，却也在《大亚细亚主义和新亚细亚主义》中批判了浮民和民。他认为这些老师都是有丰富专业知识的学者，但他们歧视中华民族的观点和态度是错误的，不可取的，必须清除他们思想带来的影响。

务实

李大钊认定“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就。”他鄙视那种泛泛空谈，不老老实实学习，不认真解决具体问题的人；他同样最厌恶那些闭门造车，不同现实相联系，不把知识服务于人类的人。他认为“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与真

实，只要有了光明与真实，什么东西，什么境界都不危险”。李大钊说：“知识是引导人生的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要达到光明与真实，就要学习知识。自1907年9月起，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读了6年书，为的是“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他愤怒控诉反动政府不准人们学习新知识、接触新思潮的行径，指出：“禁止人们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行，禁止人们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

他通过各种方式努力践行知行合一的治学理念，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创办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再论问题与主义》，使一切反马克思主义谬论相形见绌。一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至今放射着历史的光辉。他认为，“国人第一弱点在凡事皆以感情为主，不以理性为主。上至军国大计，下至私人交际，但见感情作用，不见理性作用。国人第二弱点在凡事好依腕力而争，不依法律而争”。他认为对国人心理结构的改造将是伴随着物质资料提供的丰盈程度而发生渐进演变的过程，只有经由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来实现。

为此，1917年之后，为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他认真阅读和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联系中国社会现实，为振兴中华寻找“根本解决”之路，最早提出“实际行动”的主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际，他积极响应爱国青年并迅速成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在《新青年》上发表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顺应时势介绍并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响了第一枪。他没有提出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却十分明确地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必须与时俱进，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所不同，而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和空谈。这些皆是李大钊读书求真知、务实求真理治学之道的体现。

